

概念化史學：超越革命與反革命

● 陳亞平



傅勒 (François Furet) 著，孟明譯：《思考法國大革命》(北京：三聯書店，2005)。

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傅勒 (François Furet) 的《思考法國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下引此書，只註頁碼)，是年鑑史學從非政治史、非事件史和「長時段歷史」傳統重新轉向政治史、事件史的標誌性作品。這部著作對法

國大革命重新展開概念化分析，成為徹底顛覆兩百年來大革命史話語傳統的紀念碑。它也招致來自大革命史權威的連聲斥責，被當成是一個對大革命感到「幻滅」的人的「情感自白」。直到1989年，在大革命迎來二百周年紀念的時候，傅勒和他的著作才終於贏得學術勝利。這部書成為法國大革命史研究中最具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一度被目為「修正主義」史學代表的傅勒也在電視這種現代媒體的集體哄抬中被封為「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學術王」；它還標誌着法國學術思想的一次重大轉折——就像發生在法國史學界的一次「熱月政變」。

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話語權佔據了絕對籠罩性地位的世紀。二十世紀沸沸揚揚的革命事件，都起源於1789年開始的「同一個奠基事件」。傅勒說，法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母親」，「布爾什維克的前輩是雅各賓黨人，而雅各賓黨人扮演了共產黨人的前身」(頁11)。1789年及其後的五年，僅僅是漫長的人類歷史短暫的一瞬，卻為它後後的世紀留下了永久的思考與懷

《思考法國大革命》對法國大革命重新展開概念化分析，成為徹底顛覆兩百年來大革命史話語傳統的紀念碑，它也招致來自大革命史權威的連聲斥責，被當成是一個對大革命感到「幻滅」的人的「情感自白」。它標誌着法國學術思想的一次重大轉折——就像發生在法國史學界的一次「熱月政變」。

舊的大革命史學在「資產階級革命」這一主導概念的「面模」背後藏着兩個預先的假定：事件的必然性：大革命成為一個命定的歷史事件；時間的中斷：「資產階級革命」的史學概念按照它所確立的新制度的模樣「對立地」界定了「『舊制度』的回溯性幻象。」1789年既代表了與過去的封建主義的決裂，又成為資產階級所有未來事業的淵源。

想。我們的時代不得不是一個活在大革命背影中的時代。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說：法國大革命使二十世紀的歐洲成為一個革命的歐洲，同時也一直是一個「無休無止的反革命的歐洲」，「帶着其色彩強烈的場景、其聖徒和殉難者、其教訓及其未能實現卻永遠復活的強烈願望，大革命幾乎像聖經似的矚望着二十世紀」(布羅代爾著，蕭祖等譯：《文明史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338)。直到今天，人們依然無法走出大革命的籠罩性影響，對大革命歷史的評判依然難以擺脫那些親歷大革命的先驅者的思想和主張。大革命的歷史寫作注定只能成為史學家奉獻給大革命傳統的隆重紀念儀式，旨在樹立和擦拭大革命的歷史豐碑，增加其榮光與夢想。甚至當歷史學由政治性向社會性轉移之後，那些包括了經濟與社會變遷的博學的社會史寫作，也不過是歷史家「奉獻給大革命傳統的新綴飾罷了」(頁17)。

傅勒發現，舊的大革命史學在「資產階級革命」這一主導概念的「面模」背後，藏着兩個預先的假定：一個是事件的必然性：大革命成為一個命定的歷史事件；一個是時間的中斷：「資產階級革命」的史學概念按照它所確立的新制度的模樣「對立地(a contrario)」界定了「『舊制度』的回溯性幻象」。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概念把大革命發生之前和它之後的歷史概念系統化、模式化，「結果給一種有關本質和宿命的形而上學戴上了桂冠」(頁31-32)。

傅勒指出，那種長期以來通行的「馬克思主義通俗版本」的大革命史學，把第三等級的緩慢崛起以及1789年的顛峰時代從根本上納入資本主義的進步過程。「1789年革命的決裂被擴大到經濟生活，同時也擴大到整個社會：之前是封建主義；之後是資產階級」(頁22)。這種「把革命所帶來的(歷史)中斷(斷裂)置於經濟和社會層面」的研究，把歷史思想的重點放到大革命的歷史起因和現實成就上，1789年既代表了與過去的封建主義的決裂，又成為資產階級所有未來事業的淵源。

1789年的三級會議上，米拉波(Honoré Mirabeau)朝路易十六(Louis XVI)派來的典禮官宣告：「去告訴您的主子，我們經人民授權聚集到這裏，你們將無法奪走我們的這個權力，除非用刺刀。」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人這樣對法國國王說過話。人民從此成為真正的統治者，甚至連國王也只能是人民的代理人；不是人民為統治者服務，而是統治者應該為人民服務；不是國王及貴族擁有對他們的臣民實施統治的權力，而是那些大街上和市場上的人應該行使統治權。「巴黎的集市上的女商販和小市民們則走上街頭向凡爾賽宮進發，打死守衛，衝進有極美的水晶枝形吊燈、鏡子和錦緞裱糊的豪華大廳，迫使國王和他的妻子瑪麗亞·安托利內特(Maria Antoinette)帶着孩子和隨從一起來巴黎」(貢布里希[E. H. Gombrich]著，張榮昌譯：《寫給大家的簡明世界史》[桂林：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2003]，頁338)。人民用武力攻佔了巴士底獄，釋放了關押在那裏的舊制度的叛逆者和挑戰者。大革命史的研究者非常肯定地說，大革命顛倒了舊的封建秩序，創造了人民主權；大革命創造了新的歷史。

傅勒揭掉了傳統史學給大革命披上的概念化外衣，認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把世界顛倒了」，大革命歷史實踐和歷史意識表面看來好像「是人類歷史上最天經地義的事情似的」，這實際上遠離了歷史真實。「路易十六統治下的法國社會已經和路易一菲力普 (Louis-Philippe) 時代的法國社會一點都不同了……無論資本主義還是資產階級都無需借助革命就可以登上十九世紀主要歐洲國家的歷史舞台」(頁36-37)。大革命沒有也不可能造成法國歷史的真正「中斷」，「大革命是循舊制度的思路而來的」(頁28)。傅勒和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一樣把大革命當作一個與過往社會保持血肉聯繫的連續過程，「行政國家和平均主義社會本身就是舊式君主政體特有的事業，大革命只是使之擴大、鞏固和臻於完善罷了」(頁35)。但是，革命從攻佔巴士底獄，到羅伯斯庇爾 (Maximilien Robespierre) 的公安專政，不得不以接連不斷的暴力和軍事勝利來校正其方向，推進革命，為權力正名，極大地偏離了以往歷史的連續性程序。

按照「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邏輯，從1789年開始，革命與反革命雙方對立，殊死搏鬥。一方是被「指定給封建反動派角色」的貴族

階級，另一方則是率領着整個公民社會的資產階級。前者狂熱地、幾乎凶險地要重建舊制度和社會階層，後者要聯合起來反對貴族階級只有一條不可避免的出路：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的概念邏輯加上歷史學家知識簡單化的毛病，為政治暴力提供了解釋的理由。「這種史學在概念化的色彩下把革命意識的基本特徵漫畫化，已經到了胡謔嚴謹性的荒唐地步」(頁33)。歷史學家關於革命起源的爭論並不能涵蓋革命過程出現的全部問題，革命一旦爆發就自行展開了它的後果。就連聖賈斯特 (Saint Just) 也承認，在革命中產生的那些「事件的壓力可能把我們導向了與本意不符的結果」。

那麼，到底是甚麼力量使法國大革命偏離其「本意」，走上了雅各賓派的暴力恐怖？為了揭示這個問題的根本，傅勒繼承了歷史學家科欽 (Augustin Cochin) 的事業：重新確立大革命的歷史概念。他發現「雅各賓主義在『人民』這個虛構的年號之下取代了公民社會和國家。經由公意，王者人民 (le peuple-roi) 從此神秘地與權力重合；這個信仰成了極權主義之母」(頁258)。而這一切恰恰又是在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哄抬中逐漸膨脹起來的。

「絕對的」君主制將整個社會以同心圓的方式並按等級次序圍繞排列起來，使君主與貴族成為一切社會生活的組織中心。大革命創造的新型政治人際關係是一個由「輿論」編織起來的在咖啡館、沙龍、聚會場所和「學社」裏產生的民主人際關

傅勒和托克維爾一樣把大革命當作一個與過往社會保持血肉聯繫的連續過程，認為大革命沒有也不可能造成法國歷史的真正「中斷」，「大革命是循舊制度的思路而來的」。但是，革命從攻佔巴士底獄，到羅伯斯庇爾的公安專政，不得不以接連不斷的暴力和軍事勝利來校正其方向，極大地偏離了以往歷史的連續性程序。

「人民就是政權」。從拉斐特到羅伯斯庇爾，他們不是急於將意志、激情、熱血和生命投向重建國家制度的鬥爭，而是在激昂的演說中散發革命家的「超前」觀念，急於用「又軟又有彈性的」輿論填補權力空間。他們知道「輿論」是一切政治鬥爭的關鍵。在輿論喧囂聲中，革命家建立起他們與「人民」的聯繫。

係。新型人際關係以平等為座標，新中心不能組成傳統金字塔形的「塔體」，被迫給自己建構一個替代性的權力形象。那是「照着國王的『絕對』權力形象臨摹出來的，只不過把它顛倒過來為民效命而已。只要思想社會或俱樂部一擁而起，奮身疾呼以民族或人民的名義說話，把各種輿論變成『輿論』，把輿論變成想像的絕對權力，就大功告成了，因為這種煉金術既排斥不同意見的合法性，也排斥代表制的合法性」。實際上，「革命」與君主制分享了同樣的權力觀念。「這種觀念……乃是舊式君主制的遺產，在它以外法國大革命是難以想像的；法國大革命意在把這種幻覺植入社會，而不是（像舊制度那樣）把它看成上帝的意志。」大革命所依賴的「革命意識」作為一種政治想像，成為「舊制度」想像物的一個倒轉（頁58-59）。

「人民就是政權」。問題「在於弄清誰代表人民，或者代表平等，代表民族國家：誰有能力佔領並保持這個象徵性地位，誰就決定着勝利」。從拉斐特 (Marquis de Lafayette) 到羅伯斯庇爾，他們不是急於將意志、激情、熱血和生命投向重建國家制度的鬥爭，而是在激昂的演說中散發革命家的「超前」觀念，急於用那種「又軟又有彈性的」輿論去填補權力空間。他們知道「輿論」是一切政治鬥爭的關鍵。「合法性屬於那些象徵性地代表人民意志並成功地統轄人民機構的人們」（頁73）。在輿論喧囂聲中，革命家建立起他們與「人民」的聯繫。那些參加革

命、集會、遊行，在重大「日子」上街活動的人們，構成了抽象人民的可視可見的支柱。從米拉波、拉斐特，溫和派「三巨頭」拉梅特—巴納夫—杜波爾 (Lameth-Barnave-Duport)，到雅各賓激進主義「三巨頭」羅伯斯庇爾—庫東 (Couthon)—聖賈斯特，都宣稱自己代表着人民，都曾經依賴掌控「輿論」成為「人民」和國家的代言人，並且隨着輿論的洪流激蕩沉浮。羅伯斯庇爾在輿論和「意識形態哄抬」中被扶上台，成為一個神聖的象徵，「他本人就是各區的人民，雅各賓黨人的人民、國民代表制度中的人民」（頁90）。在人民的和所有以人民為名義講話的場所（首先是國民公會），他高高在上，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他的話就是這座金字塔存在的保障。因此，包括那些曾經把他扶上塔頂的人——人民可視可見的支柱，也只能閉緊自己的嘴巴。

傅勒既不在個體心理範圍內解釋雅各賓主義，更不簡單的把革命的處境和形勢作為減輕恐怖罪責的必要情結。他致力於探討大革命最神秘的地方：它的政治動力和文化動力。他對大革命史學再次「概念化」，打碎那種「革命必然產生於某些階層或社會集團的變革願望」的「誤人子弟的看法」（頁181）。他「試着將大革命中最基本的東西也是最難以把握的東西加以概念化，這個東西就是：革命洪流」。在這股革命的洪流中，從小生活在妹妹和幾個嬸嬸之間、備受寵愛的羅伯斯庇爾，一個來自阿拉斯地方的拘謹、

冷靜、喜歡長篇大論的、語言乾巴巴的律師，成了「不可腐蝕者」，成了先知，成了精通人民／陰謀家的辯證法這一套政治煉金術的高級術士。「他把人民主權等同於國民公會的主權。」「他對自己所說的一切深信不疑，並且用革命語言來表達他想說的一切；沒有一個同代人能像他那樣將革命現象的意識形態編碼完全內心化了。」在他身上，「權力鬥爭和為人民謀利益這兩者之間沒有任何距離」。所有和他的意見不一致的人，都成了法國的敵人，平等的敵人，民族和人民的敵人，都必須被送上斷頭台。「斷頭台之所以新鬼源源不斷，是因為他那套關於好人和壞人的說教；這種說教給了他無比駭人的權力，可以規定由哪部分人民來填滿監獄」（頁89-90）。

傅勒沒有急於把羅伯斯庇爾從傳統紀念性歷史學的聖殿中拋擲出來，朝着他潑灑污水。傅勒眼裏的羅伯斯庇爾，即使成了被摘下面具的陰謀家，也僅僅是那個恐怖時期「斷頭台的替罪羊」，「他是執政的大革命」。羅伯斯庇爾深信他的理想，他不僅要從政治上解放他的人民，還要解放他的人民的「靈魂」。革命法律廢除了上帝，規定人民只能禮拜理性。一位年輕印刷工人的未婚妻被當作理性女神，穿上白衣藍袍，在喧鬧的音樂聲中穿過城市，展現理性之神聖潔的形象。巴黎舉行了崇敬「最高存在 (L'Être suprême)」的盛大節慶，在無數的花圈、花束、聖歌、讚辭和演說激起的激越喧鬧的富麗掩飾之中，羅伯

斯庇爾以「最高存在」的牧師的身份走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他頭戴羽飾，手持花束和麥穗，神色凝重，身後是國民會議和五十萬巴黎人民組成的革命洪流。他不曾注視國民會議議員的喃喃譏刺，毫不在意「獨裁者」和「暴君」名聲；也不曾考慮這個神聖隆重的慶典上爆發出的指向他的行為的「哈哈大笑」。他聽不進任何寬恕和同情的呼聲，將昔日的朋友丹東 (Georges Danton) 斬首。他聲稱處決行動才剛剛開始，到處都有自由的敵人，祖國處在危險之中。但是，1794年7月27日，他在「羅伯斯庇爾萬歲」的口號聲中被反對者逮捕。經過長時間的遊行、示眾和侮辱之後，28日，羅伯斯庇爾未經審判就被送上了斷頭台。

傅勒將法國革命重新「概念化」，在大革命「輿論」的洪流中思考「革命」與「反革命」，難免會使大革命的那些「充滿奇迹和半人半神或『巨人』的英雄傳奇，被部分地抹去，因客觀主義史學家辨明真像的非神話努力而失去了光澤」。但是，事實上正是大革命的語言，甚至就是羅伯斯庇爾們的語言，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語言，傳到了二十世紀。「全民普選，教會和國家分離，規定對財富進行某種再分配的風月法令。」所有這些，都在我們的時代被一一復活了，並給我們帶來好處 (布羅代爾：《文明史綱》，頁340)。布羅代爾的話不是針對傅勒重新概念化的大革命史說的，卻也點明了歷史修正主義的現實處境。

傅勒將法國革命重新「概念化」，在大革命「輿論」的洪流中思考「革命」與「反革命」。正是大革命的語言，甚至就是羅伯斯庇爾們的語言，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語言，傳到了二十世紀。「全民普選，教會和國家分離，規定對財富進行某種再分配的風月法令。」所有這些，都在我們的時代一一復活了，並給我們帶來好處。